

从
書

XIBU JIAOYU CANKAO

西部教育参考 9

新课程改革与教学环境关系探讨



20 世纪中国的教育改革

农村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困境和对策
西部地区英语教学情况的调查和思考
网络环境下教师角色的转换

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

《西部教育参考》编辑委员会

编辑指导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孔令纪(甘肃省人事厅副厅长)

田慧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孙 杰(甘肃省教育厅副厅长)

李贵富(甘肃省教育厅副厅长)

编辑执行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登霄 李波 吴亚白 张芄 张海鹰 哈登·巴特尔 唐克

主编 王忠民

名家寄语

让课程改革之花
遍地盛开

《西部教育参考》编委会纪念

顾振彪
二〇〇七年五月



顾振彪, 1942

年12月出生, 上海嘉定人。现为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
审, 课程教材研究

所研究员, 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兼
职研究员, 教育部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
核心成员, 初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材
(人教版)主编。与人合著《语文课程与语
文教材》《语文教材的编制与使用》《文学
写作技巧七十题》等, 并发表论文数十
篇。

目录

本辑特稿

- 简论 20 世纪中国的教育改革 /1

西部教育文摘

-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6
农村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解困之策 /9
关于西部民族中学理科教学的调查研究 /12
西部小学英语教学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16

课改前沿

- 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理论与实践 /20
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初期遇到的问题及
教师指导策略 /26
新课程背景下的校本教研实践建议 /31
在困惑中前行
——课改实验自评与反思 /33
小组合作前要教会学生什么 /35

西部·贫困地区教育专稿

- 农村贫困地区新课程实施的现实困境与
对策分析 /37

西部·农村地区教育专稿

- 初探农牧村学校语文学科与信息技术
整合的理论与实践模式 /40
农村小学教研工作问题之我见 /44
农村中小学班级管理的问题及其原因 /46



西部·民族地区教育专稿

甘肃民族县区中小学生学习不良调查分析 /50

和谐校园

建立和谐人际关系 促进学校和谐发展 /53

构建和谐校园的思考 /55

若干管理信条点评 /57

教学在线

语文教学中如何进行“研究性学习” /60

让语感之船浮在生活积累的平面上

——对语文课堂“生活化”的再思考 /61

浅谈小学语文的综合性学习 /63

科学引领,提升“对话”实效性

——浅谈小学“高段”阅读教学 /66

对指导创造性作文的几点认识 /69

话题作文拟题策略 /71

让诗歌教学真正走进学生的心灵 /73

重演物理知识的发生过程

——浅谈插图在物理复习中的作用 /75

新《英语课程标准》下如何面对语法教学 /77

你说我说

再来探讨启发式教学 /80

新课改背景下要注重培养语文教师的三种能力 /82

浅谈网络环境下教师角色的转换 /85

尽显“方寸之地”的魅力

——谈评语的改革与创新 /88

怎样实施对学生的形成性评价 /90

高考英语书面表达测试与应试技巧 /93

幼教天地

浅谈儿童早期多元智能的培养 /95



探究园地

- 赏识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的捷径 /97
- 运用伴随语言,激发学生学习欲望 /102
- 对“研究性学习”的再认识 /103
- 浅议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106
- 适时点拨 激活思维
——对高中语文课堂教学的点滴思考 /109
- 激发兴趣 感受成功 /112
- 高中音乐教学过程中的自由接受方式 /114
- 让环境教育不再离学生遥远
——关于地理教学中实施环境教育的思考 /116
- 注重学生良好的语感和阅读习惯的培养 /121
- 双语数学教学过程中的误区初探 /123
- 兴趣对化学“入门”的作用 /127
- 新课标初中化学教学的几点体会 /129

班级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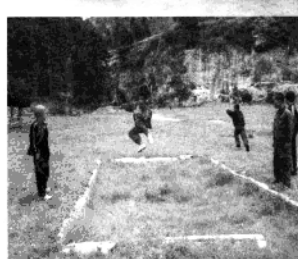
- 班主任应用好这几个成语 /132
- 我做班主任的几点体会 /133
- 浅谈如何转化学困生 /138
- 如何帮助学生克服厌学思想 /140

名师点拨

- 从一道分数应用题的解答理解“一题多解”的
价值 /142

说课评课

- 让人“寻味”的一堂课 /147
- 听两位名师教《我的战友邱少云》 /150
- 从一次失败的辩论想到的
——浅谈个性化阅读的重要性 /152
- 资料性课程资源在结课中的效用例谈 /155
- 警惕数学课堂教学中“虚”的现象 /159





课堂诊所

课堂提问刍议 /162

新教材课堂教学问题例谈 /164

理论之窗

建构主义教学模式/166

思想碎语

小溪青螺 /172

域外拾贝

发达国家教师聘任制的做法及启示 /176

西部教育文艺

数学之美 /179

踏进金色的花海 /181

旧宫殿 /183

小资料

美国的十大财富 /15

我国行政区划的起源 /43

中日历史考题比较/65

台湾国文科试题选登 /139

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146

古汉语的活化石——闽南语 /154

(本辑部分图片由杜建民、曹小强提供)

通告

《西部教育参考》已与龙源期刊网合作。来稿凡经《西部教育参考》使用,如无电子版方面的特殊声明,即视作同意上网传播。

特此通告。

简论 20 世纪中国的教育改革

胡德海

20 世纪已经过去了。20 世纪中国教育存在和发展的状况，对不少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理论工作者来说，不仅有较长期的亲身经历，也有较深切的具体感受，我们有责任为之作一番历史的回眸与反思，乃至作出一定的理性的概括。我在此文所要论及的 20 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改革问题，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与感受。文章的纲目和内容大致如下：

一、教育改革是 20 世纪中国教育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特点

20 世纪中国教育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特点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可能回答各异，见解不同。在我看来，可以用“改革”二字来作概括。这就是说，教育改革或称改革教育，我认为便是 20 世纪这百年来中国教育的主要气候和基本内容及其存在和发展的一以贯之的主要特点。

20 世纪中国教育的这个根本特点，19 世纪不具备，19 世纪以前的任何一个世纪更不具备。20 世纪不仅具备，而且已经结结实实地实践了一百年。20 世纪的后半叶，教育改革、教育

革命的口号一直非常响亮，其实践的力度既大且久，作用既深且远，以往的人们不仅记忆犹新，感触良深，亦仍为今后教育工作的根本使命与广大教育工作者必须普遍参与的现实课题。这是大家都很清楚。

在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掌权主政时期，教育家陶行知、雷沛鸿等对中国教育的改革，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影响之广，早为国人所熟知。

其实，就是在清朝政府统治下的 20 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间，中国教育事业不仅进行了改革，而且其改革本身也堪称是规模空前、史无前例的。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沿袭了一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就是在这个时候废除的。20 世纪初提出的“废科举、兴学校”这个口号不仅标志着中国教育事业、教育制度根本性的历史转折，并且也是在 20 世纪的中国建立与欧美基本一致的现代教育制度的现实起点。对此，我们不但不能置之不顾与无视，而且也不能小觑。

在 20 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间，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平均以每年 15% 的速度增长。现代性质的民法、刑法、公司

法、破产法及《著作权章程》也是相继在这个期间颁布实行的。这些都和新的学校教育制度一样相继出现，反映着社会的渐变和新的动向。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及其部属掌握全国政权达16年之久。袁世凯及以后的北洋政府的当政者，曾经声名狼藉，而从经济上看，他们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正是在这16年里，其为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奠定了法治框架。现代化的金融体系已见端倪。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从民国元年到民国十年间持续增长，在度过11至13年间的局部危机和结构调整后，1925年至1927年又有了新的发展。而从教育上看，大学及专科毕业学生由民国元年的490人，增至民国五年的1470人，民国十年为近2300人。小学在校生则由280万增至民国十一年中的660万。在学术文化领域，北洋政府可以说大体是尊重学术自由和思想言论自由的，这是当时出现历史上罕见的百家争鸣现象的重要原因。中国本世纪几位著名教育改革实验家的实验方案，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实验、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实验、黄炎培的职业教育实验、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实验都活跃在这个时期。

所以，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在政治上尽管有四种不同的政权和当政者，他们当权主政的时间也长短不一，管理和统治的手段方式也大相径庭，其中不少根本不喊教育改革这类口

号，却都在进行着教育改革的工作。把这些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不难发现，教育改革或称改革教育正是这个世纪自始至终和一贯之的根本特点。

二、20世纪中国的教育改革起步于19世纪中叶

我们不能说改革教育是19世纪中国教育的根本的、一以贯之的特点，但必须说20世纪中国教育的改革发源于19世纪，起步于19世纪中叶。

历史知识告诉我们，从19世纪到20世纪，时代给中国提出的历史任务，是要实现社会的转型，从封建社会转化成为现代社会。所谓现代化和中国当今的现代化事业，无非就是要解决这个转型问题。

20世纪的中国教育，也是这样。20世纪中国教育的改革，也是这样。20世纪中国教育的改革，作为一个世纪性课题和时代的主旋律，也不是到了跨进这个世纪的门槛后才被人们认识到和提出来的，而是早在19世纪人们就已议论开，乃至被逼着要做的一件大事。在19世纪，时代给中国社会提出的历史任务是既要实现社会的转型、走现代化社会之路，与此同时并与此相适应的是，还要实现教育的轨制改制，使之转化成现代教育。总之，20世纪中国教育的改革之路，并不是仅属本世纪范围内的偶然之事、冒然之举，而是一种蓄之已久的时代、历史发展的趋势。对中国教育全面改革之举，虽然发生在20世纪这百年间，然而历

史地看,它在19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开始酝酿,并已实际地局部地开始实施了。整个20世纪中国教育的改革,不过是在19世纪60年代已起步的历史性教育变革基础上的继续深化而已。

三、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基本走向和主要内容

如果把20世纪中国的教育改革比作一艘航船,则这艘航船的起锚启程应始于19世纪的60年代。而其领航员则为张之洞和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批主张革新人士。张之洞,人们都知道他是近代中国政治、工业、教育、学术等领域的一位重要而复杂的人物。纵观他一生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可以说,在他身上清晰地反映了中国近代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和此消彼长的文化和教育发展的历史。因此,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确有其重要地位。他的“中体西用”的思想,从文化建设方面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见解。这种思想作为清末的统治思想,影响了文化政策的修订,影响了学制,并促进了教学内容的改革和留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张之洞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历史人物,他的最重要的历史影响,是为新学、西学以及现代教育思想和制度在这块土地上的移植和推行首先亮起了绿灯,作了切实的引渡,起了首要的必不可少的作用。

教育改革之舟行驶到了20世纪,在20世纪的前叶,主要的使命与特点

是引进西方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具体落实到这时中国所面临的转轨改制的历史课题。具体的教育事务主要是兴办从西方引进的各级各类学校。由于时代与社会的需要,这个时期就有各种教育人才、新式教育家应运而生。这些教育人才和新型教育家无一不是最具革新精神的教育改革事业的有为之士。就以蔡元培来说,蔡元培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中对北京大学的领导与管理,所根本坚持和贯彻始终的就是除旧布新的改革精神。而这个时期中国不断出现的崭新的教育面貌,正是当时所涌现的这些教育革新之士卓有成效工作的结果。

在西方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的引进、发展和完善过程中,也伴随着教育事业中国化、民族化问题的探索和改革活动。这是因为这时所推行的教育制度,虽属新学范畴,属于世界较先进的一种教育制度,但它到底是一种舶来品,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所以,20世纪的中国教育既有转轨改制的内容,也有以中国化、民族化为目标的教育探索和教育改革的历史任务。于是在这个领域之后又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教育改革家,而其中以陶行知和雷沛鸿为代表。

总的来说,教育改革家的目光所及是在探索中华民族整个教育的出路,他们怀着经国济民之志,一般都是站在时代和社会的至高点上来思考教育问题的。但是纵观陶行知和雷沛鸿这些教

教育家们一生的教育实践活动和教育思想,由于他们进行教育改革、实验活动范围不同,也就有教育视野宽窄的区别。相对而言,陶行知应属微观领域的教育改革家,而雷沛鸿则属于视野更为宽广的宏观领域教育改革家。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教育改革家雷沛鸿怀抱着“教育为公、学术为公、天下为公”的理想,曾经指出:“20年来,热心于教育改革运动的人士,不断发出教育‘本土化’‘中国化’的呼声,避免生吞活剥地移植外国教育制度,而这却不能在我国的土壤——民众生活——萌芽、生枝、发叶、开花、结果。”而他却要知难而进,求实开拓,以整个广西教育为起点,以全国教育的改革为目标,决心完成一个“每一个人自生至老死均能与教育有缘的教育制度”,“徐图构成一个富有生长性和普遍性的民族教育体系”,把全部精神投入到“教育的大众化”中。在雷沛鸿孜孜不倦的努力下,在他打好的基础上,在三四十年代的广西,终于出现了“有一整套科学理论、严密计划、长时间大面积地推行、实践,形成了一个独特而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他创立的体系,从教育层次上说,包括学前、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从教育内容上说包括爱国教育、生产教育;从办学形式来说,既有定式教育(学校教育),又有非定式教育(社会教育);从教育对象上说,即有学龄儿童少年,又包括一切失学成

人,还有为经济文化特别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特殊的教育训练;从实施方法上看,重视“学术劳作”,打破中国学术重思辨轻实践的传统,所实行的措施必“由调查而假设,由试验而推广”;从组织机构上看,除教育机关之外,尚有教育科研机关,实验设施;从实施地域来说,不是一县数县,而是整整一省,“并终以其相当程度之成功影响全国,推行全国”。

他要求改变片面的偏重于升学的学制结构,认为“前一层次的教育不应该跟着后一层次的教育跑,而后一层次的教育则应当设法与前一层次的教育相衔接。每个层次都应该有弹性”。“为了适应地方建设的需要,农、工、商、矿、师范等专科学校应尽量设置”。

雷沛鸿为了自己教育理想的实现和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可谓呕心沥血,历尽艰辛,成就卓著,影响深远,堪称中国20世纪上半叶教育改革家的杰出代表。雷沛鸿是广西人,他终其一生的事业和活动范围也主要在三四十年代的广西,但他绝不只是广西的土特产,他的教育实践与思想,同样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是我国教育界和教育理论界的共同精神财富。

在20世纪的后半叶的前期近30年的时间中,教育改革的锣鼓,可以说始终不绝于耳,而且也始终雷厉风行,搞得轰轰烈烈。不过失误与挫折也最多。如大家所熟知的1958年的所谓教育大革命和历时达10年之久的文化

大革命。这些以教育革命、文化革命的名义出现的教育改革，不仅无助于教育文化在中国土地上的正常生存与健康发展，而且还曾经给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以致命的打击和破坏。所以，在前30年的时间里，综观其教育改革的是非、功过、得失，其主要的方面并不是“是、功和得”，而是“非、过与失”。在这方面，这里只能笼统、简略地谈及，相信历史将会对此有更详尽的分析和揭示。

20世纪后半叶的教育改革，真正值得肯定的是后20年。而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真正为中国教育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是邓小平。邓小平为中国教育事业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可以用“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八个字来概括。即拨长期极左路线之乱，反现代教育事业之正。他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理论与在前30年的指导思想上对知识的极端蔑视和在实际生活中对人才的严重摧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不啻是20世纪后20年照耀中国教育事业的一轮红日。长期笼罩在教育领域的“极左”阴霾因之而敛迹，并得以不断扫除。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命运也因此而得到了根本的改变，使我国教育事业的正常生存与健康发展展现了无限光明的前景。

四、回眸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基本过程和咀嚼人类几百年来基本经验

20世纪中国，在教育领域曾经提

出过不少动听、响亮的口号，特别在世纪末前30年中如此。但是，我们今天来考察、思考、鉴定这些口号，应当看到，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口号是不多的。这也正说明了历史的公正。历史的这种公正性主要表现在绝不看人的脸色行事，绝不听从人们随心所欲的主观意志，而只肯定真正经得起长时间考验的东西。通过百年教育改革的历史实践，只有党中央在后20年中所重新发现并肯定的诸如“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科教兴国”以及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么几条有积极意义。而不能肯定诸如“兴无灭资”“阶级斗争为纲”那一些。因为前几条不仅经过社会主义国家反复实践对比，证明是正确的、可行的，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是一切发达国家之所以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取胜的根本法宝。譬如，“教育为本”、“科教兴国”这些口号，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是由党的领导人或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提出的，然而绝不能说是发明，而只能说是重新发现与认识。不少资本主义国家如英、美、德、日等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实践过，19世纪后半叶与20世纪前几十年中，一些敏锐的中国人，早已觉察到其中的奥秘，并且就曾不断提出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之类主张，只是中间插（下转第151页）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 若干问题的思考

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课题组

一、重建教师工资保障机制

国务院的《通知》和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都专门提到要进一步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的保障机制,并要求确保农村教师工资按照国家标准按时足额发放。《通知》还进一步指出,中央将继续按照现行体制对中西部及东部部分地区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经费给予支持,同时要求省级人民政府加大对本行政区域内财力薄弱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请注意,这里的关键词是“按照现行体制”执行。何谓“现行体制”?即“以县为主”或“县级统筹”的体制。换言之,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保障问题并未列入此次“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即“省级统筹”的范围之内,而继续留在“县级统筹”的体制之中。

那么,在“县级统筹”之下的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如何呢?

(一)农村中小学教师收入下降

根据我们的调查,实行“县级统筹”后,江西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按

照国家标准按时足额发放问题的解决确有了显著的改进,已经基本不存在拖欠现象。但困难和问题仍然不少。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一是由于县级财力不足、保障不力,许多地方性补贴都转嫁给了学校,从而或打折扣或由于学校负担不起而干脆不发;二是教师的许多岗位津贴,如班主任津贴、超课时津贴、考核奖励等原在学校公用经费中违规发放的福利,在实行预算管理的新机制下都将面临取消。仅此两项,便将导致农村中小学教师的收入锐减。据我们初步统计,每个农村中小学教师因此减少的月收入平均将达200~300元。这对于一个月收入只有800~1000元净工资的农村教师来说,既是一个不小的经济损失,也是一个很大的精神打击。教师们自己说,在中国拿财政工资的人员中,农村中小学教师是待遇最低的群体。而且,这个群体无论在职与退休,工资待遇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此言并不夸张。

(二)建立由中央或省级统筹的教

师工资保障机制

教师是教育的根本。教师永远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学校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提高关键都在教师。要实现城乡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要使农村孩子得到优质的基础教育,首先有赖于教师队伍的稳定;其次有赖于教师敬业爱岗精神的提升;再次有赖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而要让农村中小学教师做到这些,前提是必须确保教师合理的福利待遇不因任何改革而降低,且要不分城乡,使同级同类学校教师的收入大体相当。

一般而言,教师工资是义务教育的最大支出项目,因此许多国家义务教育教师的工资都是由中央财政直接投入并予以全面保障的。法国是典型的范例。全法义务教育教师从19世纪末就确立了由中央直接统一管理的体制,有效地保证了法国各地区基础教育师资质量的一致。由于教师基本工资和岗位津贴均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同时按照国家公务员进行管理,因此教师必须服从工作岗位的调配。日本法律虽然规定义务教育经费由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两级地方财政负担,但其来源主要是中央的税收返还。特别要指出的是,日本中央政府直接负担教职人员的人头费以消除不同学校之间教师待遇的差异。日本义务教育教师同样按照公务员来管理对待,一般以5年为一个周期在市町村范围内实行轮换,从而确保了

即使在边远落后的乡村,中小学的师资都能达到规范化要求。此外,埃及义务教育教师的工资也是由国家教育部统一支付的。韩国中央政府不仅是义务教育的绝对投资主体,韩国义务教育教师也是作为公务员同等对待与管理的。

要根本改变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差距拉大的趋势,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就必须进一步完善农村教师工资经费保障机制。根据义务教育投资主体上移的国际趋势,在条件成熟的适当时机,应考虑建立中央财政直接负担义务教育教师工资的体制,或由省级统筹、中央和省级财政负担为主的保障机制。唯此才可能真正实现对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和福利待遇的强力保障,全面消除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的校际和地区差异。在教师工资保障主体上移的同时,可参照公务员管理方式对义务教育教师实行严格统一的管理,在此基础上才可能促使义务教育教师在县城或更大范围内的流动和定期轮换制度化。

二、创新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监管机制

高效安全的管理和有效的监督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成功的关键。按照“省级统筹、县级管理”的运行模式,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监管的重心,一在各级政府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经费的落实到位;二在资金分配和使用的及时、规范、安全和有效。

(一) 监管重在挑战体制弊端

关于省级统筹问题，难点主要在市、县两级分担经费的及时、足额到位上。虽然此次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地方分担主要由省级政府“扛大头”，但在江西这样的中部分省，市、县两级或多或少分别都要承担一部分责任。而这两级政府尤其县级财力相对更弱，所以，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挤出效应”仍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和事实。清华大学的张欢等博士在对 109 个县(市)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大量增加的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并没有提高县级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相反造成了‘挤出效应’。”结果是“一些对教育投入压缩程度较大的县已经造成教育经费的供给不足，一些还能够保障教育经费供给的县（实际上）也是在透支未来农村义务教育资源”。对于县级政府来说，往往还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即认为自己已经啃下了义务教育“人头费”这块“最硬的骨头”，再要承担学校运转经费特别是校舍维修改造经费就有点不近人情了。

更大、更多的问题还可能存在于资金的分配、使用等日常管理环节中。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管理的基本模式是：义务教育经费在各级财政预算中单列，同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统一进行预算编制改革，各项收支全部纳入

预算管理，实行“校财局管”、国库集中支付。表面看，这一管理模式是相对完善的。但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各种漏洞仍然是难以避免的。对此，王善迈先生认为“对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方向、使用及效果实施严格的监督管理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监管的主要方式或手段“是要完善义务教育经费的审计制度”。为此，应“建立学校内部审计与国家审计、社会审计相结合，以国家审计为主导的审计体系”。同时“审计结论要向政府和人大报告，向社会公众公开，将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分配和使用置于公共监督之下”。这也许并非是最好、最有效的监管措施，却是现行体制下唯一可行的监管方式和策略。

(二) 探索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管理新机制

深入农村中小学校的调查提示我们，完全由县级财政部门掌控的预算管理也未必能够真正适应农村中小学的实际工作需要。即使严格按照实物消耗核算确定农村中小学的预算科目及其支出水平，也难以避免中小学的预算编制管理的生硬、划一，既不能切合各校不同的实际需要，也难以因势因需灵活调整，更不可能妥善处理均衡分配与倾斜扶持的关系。

为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高效、安全、规范运作，避免地方政府的干预，同时增加资金管理的透明度，便于社会监督，使农村义务（下转第 11 页）

农村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解困之策

洪俊

制约农村义务教育课程发展的最直接因素,是办学条件、师资水平和课程的适合性,但它们又受到教育投入、办学理念和教育观念、教育体制与机制等深层次因素的影响。因此,要化解农村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困境,就必须统筹解决这些问题。笔者建议如下:

一、追求真正的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农村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内在诉求。真正的教育公平应当为农村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使他们的不同需求在基础教育这一平台上尽量得到满足,即做到教育适应学生,而不是学生适应教育。但要做到这一点,仅靠课程改革是不够的,还需其他措施的配合。

首先,要兴办“无差别”的学校,使农村义务教育具有相对充分、优质和均衡配置的教育资源。有“无差别”的学校,才有“无差别”的教育。这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基本前提。目前的课程改革是在教育资源匮乏且配置失衡的条件下实施的。这种情况即使课程改革难以达到预期的水平,也影响了义务教育的普及。为此,我们在农村义务教

育课程改革中,不仅要关注课程自身的建设,而且要关注课程实施条件的改善,这是课程改革在农村能够有效实施的根基。目前,党和国家采取的如“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两免一补”“农村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等措施,已使农村义务教育的公平发展初现端倪,并为实现“无差别”教育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其次,要完善农村的教育结构体系。目前,农村教育结构体系的失衡,使基础教育不得不承担职业教育的任务。而教育资源的匮乏,又使农村学校难担此任。有识者认为,在学习年限没有增加的条件下,农村初中开设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技术课程,是“以降低九年义务教育质量标准为前提或代价的”。因此,完善农村教育结构体系,特别是加快发展县域的高中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是满足当前农村学生多元化需求的基本措施。

再次,要注重农村学生主体性的提升与发展。笔者认为,真正的教育公平源于农村学生自我的主动发展与创造,而不是外界的赐予。就农村学生的发展而言,教育的公平,不仅要提供优

质的教育环境和丰富的教育资源,更在于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追求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学校的课程改革,更应关注农村学生主体性的提升,致力于为农村学生主体性的发展和生命价值的实现创设条件。近年来,一些农村学校以“职业生涯教育”的理念引导课程改革,使课程改革的视野由仅仅关注学生毕业后的出路,转向关注他们毕生的学习与发展;也使课程改革由局限于“绿色证书”教育,推广到义务教育阶段的全部学科与全部活动上来。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学校“普通文化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矛盾,使农村学生由被动应对外界要求转向了主动选择人生道路,向真正的教育公平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

二、坚持为“三农”服务的价值取向

为“三农”服务、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是农村义务教育应有的使命与宗旨。满足农村人口的各种学习需求,既是农村义务教育的本体功能,又是为“三农”服务的最直接体现。笔者认为当前农村义务教育的滞后不在于面向“三农”的要求,而恰恰在于忽视了“三农”的要求。其误区就在于把升学教育当做最终目的,而忽视了农村义务教育应承担的历史使命。

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来看,为“三农”服务的根本意义在于教育强农,在于促进“三农”主体性的发展及其弱势地位的转

变。因此,农村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价值取向应当是使农村教育成为“为农”和“强农”的教育。它应当以人为本,以农村学生的需求为基本切入点,强调课程对于农村学生全面和主动发展的建构意义,致力于构建适合学生主体性发展的课程与教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离农”和“务农”都应视为农村学生发展的合理需求,都是为“三农”服务应有的内涵。它们都应当是农村学生主体性发展基础上的生成性结果,而不是囿于环境、条件和机遇的被动选择。

三、建设具有农村学校特色的课程文化

这是增强农村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实效的根本之策。课程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学生的主体性和激发学生的生命活力。贴近学生生活、富有农村生活特色的课程文化,是农村学生健康和谐的心理得以孕育、产生的基础。然而,目前一些农村学校的课程却严重脱离学生的生活,使课程文化缺乏农村的特色,课程改革难见成效。因此,农村学校的课程改革,只有植根本土文化,贴近学生生活,才能激发学生内在的生机与活力,才能真正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才能调动教师参与课程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才能切实推进农村义务教育服务于“三农”。但是,农村学校的课程文化建设,还应当遵循国家课程改革的要求,否则可能成为保守的,甚至是落后的。这是因为

国家课程改革体现了先进文化的要求,是满足我国中小学课程基础性和均衡性的基本保证。农村学校的课程改革应当创造性地贯彻国家有关课程改革文件的精神。只有这样,国家文件的精神才会内化为农村学校的课程文化,既实现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又形成农村学校课程文化的特色,从而引导农村学校的课程文化建设向着既富生机又合规范的方向发展。

四、以农村教师的发展为本

众所周知,教师是课程改革成败的关键。农村学校应当把课程改革看做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机遇。近年来,为了推进农村教师队伍建设,一些地区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城市教师下乡支教、新教师到农村学校锻炼等。然而,这些措施对于农村学校的发展来说,其意义主要是“输血”,而不是“造血”。既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问题,而且农村学校课程改革滞后的状况,也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观。为此,必须探索一条

能引导农村教师完善自我、主动发展的自强之路。

从一些农村教师成长的经验来看,这条自强之路是植根于农村本土文化的“草根式”道路,即农村教师的发展主要是立足于本校实际,植根于本职工作,以课程改革为契机,在落实课改要求的过程中形成自己新的理念、新的风格和新的模式,并在促进学生成长的过程中使自己也得到发展。这种“草根式”的道路,虽然不同于传统的“学院式”道路,但却是许多优秀的农村教师的成功之路。对于缺少经费和资源的农村学校来说,这是农村义务教育课程改革脱困的根本之道。

在激发农村教师发展主动性与自觉性的同时,有关部门还必须采取各种方式加强对他们的专业引导,并在农村学校形成引导农村教师主动发展的有效模式和长效机制。

(宋时春摘自《中小学管理》,2006年第10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供稿。)

(上接第8页)教育经费能够切实支撑并保障农村中小学的正常运转与良性发展,我们认为,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应逐步探索新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管理机制。比如可以参照巴西基础教育维持与发展及教学促进基金会(FUNDEF)的相关做法,在省级人民政府领导下,组建成立专门的省级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管理基金会,作为公益性社会中介机构,各县设立分支机构,单独管理,运营农村义务教育保障经费。此举或许会增加一些公开的运行成本,但必将极大地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使有限的资金取得最大的效用。

(宋时春摘自《江西教育科研》,2006年第10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供稿。)